

诗探索

Poetry Exploration



二〇〇六年
第一辑

理论卷

时代文艺出版社

诗探索

(理论卷)

Poetry Exploration

2006年第1辑 总第60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诗探索. 2006 年. 第 1 辑: 理论卷/吴思敬 主编.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6. 4

ISBN 7-5387-2113-4

I. 诗... II. 吴... III. 诗歌—文学研究—中国—从刊 IV. I207.2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29742 号

诗 探 索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21
电 话	总编办: 0431-5638648 发行科: 0431-5677782
网 址	www.shidaichina.com
印 刷	吉林省吉新月历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30 千字
印 张	8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主 办: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

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诗探索》编辑委员会

主 任: 谢 冕 杨匡汉 吴思敬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光明 刘士杰 刘福春

吴思敬 张洪波 杨匡汉

陈旭光 林 莽 谢 冕

《诗探索·理论卷》主编: 吴思敬

投稿地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05 号首都师范大学

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诗探索》理论卷

邮政编码: 100037

《诗探索·作品卷》主编: 林 莽 张洪波

投稿地址: 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诗探索》作品卷

邮政编码: 130021

目 录

MU LU

- 1 当代诗歌：人文性资源与本土化策略 / 杨匡汉
- 7 论中国新诗的“传统” / 李 怡
- 诗学研究
 - 13 诗歌研究中的话语分析方法 / 李志元
 - 33 综合·转换·衍生
——现代诗修辞艺术的历时性考查 / 子 张 西 果
 - 47 诗歌节奏与音乐节奏
——新诗节奏理论谈（兼及闻一多“三美”说） / 龙清涛
 - 56 诗歌传播类型初探 / 杨志学
 - 70 网络诗歌研究述评 / 张德明
- 中国新诗史写作问题研究
 - 79 变动中的当代新诗史叙述
——以《中国当代新诗史》初版与修订版为例 / 霍俊明
- 结识一位诗人
 - 96 用于呼吸的声音
——谈马永波诗歌 / 孙 磊
 - 109 重瞳
——读马永波《电影院》 / 哑 石

117 客观化写作

——复调、散点透视、伪叙述 / 马永波

► 女性诗歌研究

128 大地与内心的歌者

——对冉冉诗歌的一种释读 / 邹 郎

143 突破风格化的双重尝试

——论翟永明 90 年代的诗歌风格转型 / 颜 红

► 姿态与尺度

150 在悖论的诗风暴里我们收获

——评马新朝抒情长诗《幻河》 / 张不代

169 骄傲的贫困

——读默默的散文诗 / 杨 克

177 南野：一个不合标准的写作者 / 晏 榕

► 古代诗歌传统与新诗

189 暗香浮动 冷月黄昏

——论卞之琳情诗的古典意蕴 / 陆红颖

199 忧伤的花朵

——舒婷诗与唐宋婉约词 / 杨景龙

► 诗论家研究

220 诗歌生命的解读——叶橹 / 庄晓明

► 诗歌理论著作评介

231 认领真实与重构美学

——评《沈奇诗学论集》 / 唐 欣

► 外国诗论译丛

240 形式·意象·主题：郑敏与里尔克的诗学亲缘

[比利时] 伊 歌 / 著 赵 珥 / 译

当代诗歌：人文性资源与本土化策略

杨匡汉

古、今、中、西间，最重要的是“今”，是当代。没有今，没有当代的价值判断，没有当代人的思维和精神，对许多诗歌问题会抽象不上去，也落实不下来。

东、西、南、北、中，最重要的是东，是长江大河的流向和归宿，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是寻找梦想的场域。诗人又是天生的向太阳的寻梦者。

在诗歌界、学术界，人们都喜欢谈论东西方文化/文明的冲突。实际上，文化/文明的异质性或不可通是客观存在，本身没有冲突，真正冲突的是文化/文明的价值判断。这些年诗歌界重视跨文化的对话，对话深入下去，就发现，如果彻底瓦解自己的知识结构而迁就对方的知识结构，我们肯定要犯中国诗歌文化的“失语症”；也悟到，尽管强调对话，后来更强调的不仅是认识的文明，而是更加重新认识自己。多年大道走成河。余光中、痖弦从“走向西方”最后又“回到东方”，前卫的洛夫、罗门也要给李白、柳宗元“打一个电话”。我们一些诗人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却显出心态上的膨胀，咏叹之作呈现一种“泡沫性”和“仿制性”。所谓“泡沫性”就是把西方的价值观念无限放大，所谓“仿制性”就是对西方的表达方式亦步亦趋。两种倾向均不可取。

在这种情况下，讨论“当代性”和“民族性”的关系的确关涉到今日中国诗歌文化之走向。然而就目前而言，两者“统一”不过



是浪漫主义的理想，因为事实上，中国今日诗歌离不开“西化”和“化西”的两难命题，民族文化的自觉和全球化语境下文化价值的普世性企图之间存在着紧张。这样，中国当代诗歌究竟要不要择取人文性资源和运用本土化策略，虽然不是美学问题，但是应从诗学的角度提出来。

我以为，包括诗歌在内的任何文学创作，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对资源的汇聚、选择、利用和转化。对于当代诗歌来说，我们具有丰富的人文性资源，那些传统的理性智能与感性信息，可以帮助我们把共同的、永恒的东西显现出来。

其一是思想资源。

在我看来，中国优秀的人文精神传统，应当成为当代诗歌的重要思想资源，予以传承、激活和创造性的转化。中国人重其活出个人样，活得有尊严。为老为释，诗书礼易，汉儒宋贤，程朱陆王，代代所崇尚的，乃是为文道法谋篇，为事格物致知，为民敢歌敢哭，仁、义、礼、知、信五字并言。中国人向往更高的精神自觉——建立在忧患意识之上的实践理性。孔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庄子曰“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由此产生了“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屈原）的艺术，产生了“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的有亮节的篇章，产生了“国破山河在”（杜甫）的有浩气的诗行，也产生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的忧国忧民之大作。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崇本息末，中国志士仁人的“无恒产而有恒心”，总以国家民族大群之盛衰、兴亡为怀，这一不可征服的脊梁，维系着黄土地上万千群类和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于2000年在北京发表过一次演讲，认为中国文学史上始终有一种感时忧国的使命感，近现代也连续不断。冰雕有海涛的波纹。感时忧国的使命感正是中国文学的深远传统，是人文精神的核心内容，“蚌痛成珠”构造了从古到今大诗人创造力的心理基础和内在动因。可以注意到，池鱼思故渊，当代已有一批诗人表示出一种朴素的意愿，即应从民族的人文传统中寻找自己创

作的基石。在全球化文化价值的普世化企图日益被人们识破的情况下，民族性的文化自觉和感时忧国的使命意识已变得越来越迫切，也要求精英阶层能承担起维护民族文化的使命。然而当代的现实是，多数技术官员在文化上是中立的；经济领域的专业人士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学者、教授、作家在人文科学中的力量十分薄弱，其影响力微乎其微，处边缘地位。全球化、“后殖民”语境中能成就一大批专业精英人士，成长出一群又一群被齿轮绞成碎片的文化动物，而要产生真正具有人文关怀的知识阶层则相当困难。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时代性的文化病症。

当代诗歌何为？需要“三拒绝”：拒绝工具理性，拒绝文而不化，拒绝使命感的失落。需要“三呼唤”：呼唤人文理性，呼唤重读传统，呼唤民族的自主性和诗歌的本体论。这就需要接续中国人的文脉，吸收传统思想资源的养分，进一步盘活和翻新。

其二是美学资源。

“美学”一词从西方引进。但包括黑格尔在内的西方学者，历来不认为中国有完整的哲学、美学体系。西方诗人也从来不承认中国有什么诗学、史诗。他们用一种“主体通性”的观念来看待中国美学、诗学，既出于知之甚少，也存在一定偏见。

如果说，西方美学是以二元对立为哲学基础，以抽象思辨为思维方式，以想象性活动为实在内容，以建构“形而上”的体系为终极目标；那么，中国传统美学则是以“天人合一”为哲学基础，以感性体悟为思维方式，以人生实践与审美情趣为真实内容，以入微的观察和灵动的艺术并呈“片断”的形态为叙述点燃光亮。先秦美学可谓中国诗学的一大源头。沿着“思无邪”的思路而倡导先善后美，以善制美；强调“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而寻求主客交融，共感心会；主张“中和”而归复生命的本明，意象的化生：从“知味”、“辨味”到“治心”、“养气”，确认了体证生生，生生之韵；而从“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诗性文心，又导向了辩证且审美地处理文质、因袭、言意、形神以及多少、大小、远近、高下、浓淡、粗精等等为艺之道。中国历代文人诗家不求深奥、蹈虚、体系式



的美学概述，却视诗学（广义的或狭义的）为生命之学、心性之学，是自主的行为、人性的修炼和审美的投射。

上述美学资源相当久远，且在其深层处，可与今人心灵暗合、相通。当代诗人于坚与评论家谢有顺有一次关于“文学是慢的历史”的对话，于坚说：“三十多年前的‘文革’时代，每一个人想的都是中国古代那一套肯定是完蛋了，被踩在脚下了，史无前例的革命，摧毁过去的一切，要创造一个全新的中国，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画。但是，三十年后，书店里重新摆满了《论语》，我读里面的很多东西，觉得它就是一种真理，过去的真理根本就没有失效，你现在读这些，会使你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更智慧，比清朝更有效。”^①

不只是《论语》，还有《老子》、《庄子》、《礼记》、《乐记》、《文赋》、《文心雕龙》、《诗品》、《原诗》、《艺概》等等及至《饮冰室诗话》、《人间词话》，汇成美学的星空，诗性的智慧之光何其灿烂。对于如此丰富的美学资源，万不可以“碎片”而等闲视之，也不能从“技”、“器”、“用”的层面去打理，需要从“精”、“气”、“神”、“体”上来内化、再生。

其三是语言资源。

当代诗运用的是现代白话——活在当代人唇舌上的语言。一般讲，进入诗中的现代白话的语言资源，有历代话本、日常口语、欧化白话、市井白话、民间话语以及多民族的话语。一个时代的诗歌生命，正是依靠能用活的语言去表现情感和思想。然而，白话落实到纸面，仍是中文汉字。我们现在面临着全球化过程中失去本土的诗歌经验和语言文化的危险，最担心的是汉诗的语言的西方化。这与我们对自身的语言资源缺乏认知有关。德里达和罗兰·巴特仅仅从语音的角度就认定中文是没有能指的语言，此乃大谬。殊不知，汉字以象为本，是一种具有鲜明感性特征的视觉符号、语言符号、生命符号。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有三种：埃及的图画文字，苏马利亚和巴比伦人的楔形文字，还有就是中国的象形文字。如今，前两种文字都拼音化

^① 见《先锋就是自由》第143页，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了，惟独汉字作为形声互动的符号和显示感性信息的语码，不仅存活至今，还为诗性智慧和人文精神的霏布滋蔓提供了沛然的可能。从古到今，汉语所具有的多义、弹性、隐喻、佯谬、张力乃至以音系联、谐音游戏等等，都显示了语言的非凡魔力。像“鸟”字视而可识、察而见意、栩栩如生，而枯燥抽象的“NIAO”与之就没有可比性。

在汉语诗歌表述上，“字之多义”足资传送“情至多绪”，也很难用西方人的实证法可以寻辨文理。例如“断肠”一语，是西医用手术刀切断了大肠、小肠或直肠么？显然不是。在蔡琰《胡笳十八拍》中，“空断肠兮思悄悄”，“断肠”是极言其悲伤之情；在白居易《井底引银瓶》中，“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断肠”成了倏忽间的一阵欢喜；在李白的《清平乐》中，“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断肠”传达的是因香艳而销魂的感性迷狂；在马致远的《天净沙》中，“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那愁肠寸断之人，浪迹天涯倍思乡，一语“断肠”而尽得风流。而大量丰采的各地民间语言资源，更证明了“有限”的汉语能指“无限”的诗情意绪。况且，外来语言进入汉语以后，汉语对其有强大的改造功能和灵巧的更新功能（如“康桥”、“翡冷翠”、“粉丝”等等）。

事至今日，汉语越来越丰富、越出彩，在抵制英国化、美国化的过程中，汉语可能是最有效的一种力量。英文充其量是我们了解和认识世界的工具，而汉语才是我们母性的声音，是真正的根。遗憾的是在更年轻的一代人中，“计算机失写症”一族的队伍日见扩大，网络诗歌中汉字、拼音、英语混杂使用并力主“怪、错、别”，语言环境被污染，越来越令人焦虑。要获得主体性，首先要对汉语自我认同和自觉活用，这也是当今诗歌必须正视的一大课题。

自然，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中国当今的诗歌已经结合“当代性”的解读而寻找着、也形成着新的生长点。然而，倘若我们获得“当代性”的代价只是认知“当代性”的命名而不能真正落实到大气盘旋的诗创造，仍然是件可悲的事情。思想的贫困化、构思的单调化、语言的粗鄙化等等就发生在我们周围。中国有中国的诗歌问题，有些问题可能也是这个世界通约性的问题。对于诗歌而言，全球化浪潮只



能造成“同而不和”，本土化策略则执着追求“和而不同”——那才是中国当代诗人所期待的诗歌生态和文化理想。

本土化策略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回到传统的文本、规范、典律，而是对自己的诗歌境况做出反思，对诗歌现象做出新解，对抒情方式做出改进，从而重建自身诗歌美学历史的连续性。本土化策略概而言之，或可用十六字归纳，即：汲古润今，汲洋润中，深入当代，自主创新。我们的目标是使当代诗歌再经历一次从语境到观念、范式、表达的“凤凰涅槃”，可能是既不“古”也不“洋”的，恰恰是集百年之功又有新的深度、力度和高度的充满现代精神的新诗歌。

本土化策略在中国诗坛具有天然的特长和优势。择其要者，我们至少可以进行下列的探索：

——发掘与整理丰富的古典诗论资源，由当代意识激活而自铸新词。

——探悉属于中国文化母题性质的诗话诗语，寻求其“变奏”的规律，重新获取生命力。

——研究中国诗歌中的生命情调，并由此考虑中国人的思维习性与基本品格的当代体现。

——在中国特殊的诗歌语境下，通过细读古今名篇，而获得诗作如何“以小见大”、“以一当十”的艺术效果。

——对超出本土范围的相关性诗歌问题也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在文化碰撞中“穿越西方中心主义”。

人文性资源与本土化策略，其实是指向一个问题：当代中国诗歌文化建设的核心价值。如今诗歌的“多元”状态，既证明了开放的图景，也期待着“一体”的流向，那就是作为理想、精神承担者的当代诗人，努力以“中国产品”获得走向世界的通行证。“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再一个百年太久，但愿只争朝夕！

2005年10月20日草于北京潘家园

论中国新诗的“传统”

李 怡

讨论中国新诗的“传统”，这在今天人们的心目当中会引出两种不同的理解：一是中国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的关系；一是中国新诗自身所形成的“传统”。这两种意义上的“传统”都关乎我们对于中国新诗本质的把握，影响着我们对于其未来发展的估价。

—

关于中国新诗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关系，这在不同的时期曾经有过截然不同的理解。当我们把包括白话新诗在内的五四新文学运动置于新/旧、进步/保守、革命/封建的尖锐对立中加以解读，自然就会格外凸显其中所包含的“反传统”色彩，在过去，不断“革命”、不断“进步”的我们大力激赏着这些所谓的“反传统”形象，甚至觉得胡适的“改良”还不够，陈独秀的“革命”更彻底，胡适的“放脚诗”太保守，而郭沫若的狂飙突进才真正“开一代诗风”。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同样的这些“反传统”形象，却又遭遇了空前的质疑：“五四”文学家们的思维方式被贬之为“非此即彼”荒谬逻辑，而他们反叛古典“传统”、模仿西方诗歌的选择更被宣判为“臣服于西方文化霸权”，是导致中国新诗的种种缺陷的根本原因！其实，如果我们能够不怀有任何先验的偏见，心平气和地解读中国现代新诗，那么就不难发现其中大量存在的与中国古典诗歌的联

系，这种联系从情感、趣味到语言形态等全方位地建立着，甚至在“反传统”的中国新诗中，也可以找出中国古典诗歌以宋诗为典型的“反传统”模式的潜在影响。在《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①一书，笔者曾经极力证明着这样的古今联系，然而，在今天看来，单方向地“证明”依然不利于我们对于“问题”的真正深入，因为，任何证明都会给人留下一一种自我“辩诬”的印象，它继续落入了接受/否定的简单思维，却往往在不知不觉之中遗忘了对中国新诗“问题”本身的探究。实际上，关于中国新诗存在的合法性，我们既不需要以古典诗歌“传统”的存在来加以“证明”，也不能以这一“传统”的丧失来“证伪”，这就好像西方诗歌的艺术经验之于我们的关系一样。中国新诗的合法性只能由它自己的艺术实践来自我表达。这正如王富仁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文化经过中国近、现、当代知识分子的头脑之后不是像经过传送带传送过来的一堆煤一样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他们也不是装配工，只是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不同部件装配成了一架新型的机器，零件全是固有的。人是有创造性的，任何文化都是一种人的创造物，中国近、现、当代文化的性质和作用不能仅仅从它的来源上予以确定，因而只在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和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的模式中无法对它自身的独立性做出卓有成效的研究。”^②我们提出中国新诗并没有脱离中国古典诗歌传统这一现象并不是为了阐述中国古典诗歌模式的永恒的魅力，而是借此说明中国新诗从未“臣服于西方文化霸权”这一事实。中国新诗，它依然是中国的诗人在自己的生存空间中获得的人生感悟的表达，在这样一个共同的生存空间里，古今诗歌的某些相似性恰恰是人生遭遇与心灵结构相似性的自然产物，中国诗人就是在“自己的”空间中发言，说着在自己的人生世界里应该说的话，他们并没有因为与西方世界的交流而从此“进入”到了西方，或者说书写着西方诗歌的中国版本。即便是穆旦这样的诗人，无论他怎样在理性上表达对古代传统的拒绝，也无论我

① 李怡：《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② 王富仁：《对一种研究模式的置疑》。《佛山大学学报》，1996，（1）。

们寻觅了穆旦诗歌与西方诗歌的多少相似性，也无法回避穆旦终究是阐发着“中国的”人生经验这一至关重要的现实，如果我们能够不带偏见地承认这一现实，那么甚至也会发现，“反传统”的穆旦依然有着“传统”的痕迹，例如王毅所发现的《诗八首》与杜甫《秋兴八首》之间的联系。

然而，问题显然还有另外的一方面，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新诗的独立价值恰恰又在于它能够从坚实凝固的“传统”中突围而出，建立起自己新的艺术形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单方向地证明古典诗歌“传统”在新诗中的存在无济于事，因为在根本的层面上，中国新诗的价值并不依靠这些古典的因素来确定，它只能依靠它自己，依靠它“前所未有”的艺术创造性。或者换句话说，问题最后的指向并不在中国新诗是否承袭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而在于它自己是否能够在“前所未有”的创造活动中开辟一个新的“传统”。中国新诗的新的“传统”就是我们应该更加关注的内容。

二

讨论中国新诗的新“传统”，这里自然就会涉及一个历来争议不休的话题：中国新诗究竟是否已经就是一种“成熟”与“成型”的艺术？如果它并不“成熟”或“成型”，对新的“传统”的讨论是否就成了问题呢？的确，在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历史中，到处都可以听到类似“不成熟”、“不成型”的批评不满之辞，例如，胡适在1919年评价他的同代人说：“我所知道的‘新诗人’，除了会稽周氏弟兄外，大都是从旧式诗、词、曲里脱胎出来的。”^①七年后，新起的象征派诗人却认为：“中国人现在做诗，非常粗糙……”^②“中国的

① 胡适：《谈新诗》，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良友图书出版公司，1935年。

② 穆木天：《谈诗——寄沫若的一封信》，见《创造月刊（1卷）》，1926，（1）。

新诗运动，我以为胡适是最大的罪人。”^①十年后，鲁迅对美国记者斯诺说：“到目前为止，中国现代新诗并不成功。”^②再过六年，诗人李广田也表示：“当人们论到五四以来的文艺发展情形时，又大都以为，在文学作品的各个部门中以新诗的成就最坏。”一直到1993年老诗人郑敏的“世纪末回顾”：“为什么有几千年诗史的汉语文学在今天没有出现得到国际文学界公认的大作品、大诗人？”^③那么，这是不是足以说明“不成型”的判断已经就成为了对新诗的“共识”呢？十年前，在《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一书中，我曾经引用这些言论说明中国新诗内在缺陷，现在看来，问题又并没有当时所理解的那么的简单。因为，任何一个独立的判断都有它自身的语境和表达的目的，历来关于中国新诗“不成熟”、“不成型”的批评往往同时就伴随着这些批评家对其他创作取向的强调，或者说，所谓的这些“不成熟”与“不成型”就是针对他们心目中的另外的诗歌取向而言的，在胡适那里是为了进一步突出与古典诗词的差异，在象征派诗人那里是为了突出诗歌的形式追求，在鲁迅那里是为了呼唤“摩罗诗力”，在郑敏那里则是为了强调与古典诗歌的联系……其实他们各自的所谓“成熟”与“成型”也是千差万别甚至是针锋相对的！这与我们对整个中国新诗形态的考察有着很大的差别。当我们需要对整个中国新诗做出判断的时候，我们所依据的是整个中国诗歌历史的巨大背景，而如果结合这样的背景来加以分析，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中国新诗显然已经形成了区别于中国古代诗歌的一系列特征，例如：其一、追求创作主体的自由和独立。发表初期白话新诗最多的《新青年》发刊词开宗明义就指出，“近代文明特征”的第一条即是“人权说”。从胡适《老鸦》、《你莫忘记》到郭沫若的《天狗》，包括早期无产阶级诗歌，一直到胡风及其七月派都是在不同的意义上演绎着主体的意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诗人自我的强调已经与中国古典

① 王独清：《再谈诗——寄木天、伯奇》，见《创造月刊（1卷）》，1926，（1）。

② 《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见《新文学史料》。1987，（3）。

③ 李广田：《论新诗的内容和形式》，见《诗的艺术》。开明书店，1943年。

诗人对于“修养”的重视有了截然不同的内涵。其二、创造出了一系列的凝结着诗人意志性感受的诗歌文本。也就是说，中国诗歌开始走出了“即景抒情”的传统模式，将更多的抽象性的意志化的东西作为自己的表现内容。与中国诗学“别材别趣”的传统相比较，其突破性的效果十分引人注目。这其中又有几个方面的具体表现：一是诗人内在的思想魅力得以呈现；二是诗人以主观的需要来把玩、揉搓客观物象；三是客观物象的幻觉化。其三、自由的形式创造。“增多诗体”得以广泛的实现，如引进西方的十四行、楼梯诗，对于民歌体的发掘和运用，以及散文诗的出现，戏剧体诗的尝试等等。虽然在这些方面成就不一，但尝试本身却无疑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在这方面，郭沫若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好些人认为新诗没有建立出一种形式来，便是最无成绩的张本，我却不便同意。我要说一句诡辞：新诗没有建立出一种形式来，倒正是新诗的一个很大的成就。”“不定型正是诗歌的一种新型。”^①显然，在这位新诗开拓者的心目当中，“不成型”的中国新诗恰恰因此具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姿态，而“自由”则赋予现代诗人以更大的创造空间，这，难道不就是一种宝贵的“传统”吗？与逐渐远去的中国古代诗歌比较，中国现代新诗的“传统”更具有流动性，也因此更具有了某种生长性，在不断的流动与不断的生长之中，中国新诗无论还有多少的“问题”与“缺陷”，但却的确已经从整体上呈现出了与历史形态的差异，这正如批评家李健吾所指出的那样：“在近二十年新文学运动里面，和散文比较，诗的运气显然不佳。直到如今，形式和内容还是一般少壮诗人的磨难。”“然而一个真正的事实是：惟其人人写诗，诗也越发难写了。初期写诗的人可以说是觉醒者的彷徨，其后不等一条可能的道路发现，便又别是一番天地。这真不可思议，也真蔚然大观了。通常以为新文学运动，诗的成效不如散文，但是就‘现代’

① 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见《文学评论》，1993年（3）。